

国际政治

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荣正通 胡礼忠

【摘要】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危机决策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的,但是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实际的管理行为只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影响了肯尼迪总统理性调控危机的构思和执行。“有限理性”由于“有限”一度使危机有转化成战争的危险,也由于“理性”最终使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为我们认识国际危机管理中的“有限”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古巴导弹危机;危机管理;有限理性;肯尼迪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1-0001-05

一、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国际危机管理的核心是危机决策,其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危机管理的成效。《辞海》对“决策”所下的定义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寻求并实现某种最优化目标即选择最佳的目标和行动方案而进行的活动”。^[1]根据古典的决策模型,决策者在效用和可能性这两个基本层面上进行计算。决策者被假设为理性的人,所以他们会争取预期效用的最大化。换句话说,在考虑了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权衡了它们的价值,并评估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决策者就能够做出最优选择。^[2]

事实上,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决策并不都是完全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的。决策过程涉及理性、价值判断以及包括政策制定者的心理情结在内的各种无理性或非理性因素。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危机决策可能不符合假设的完全理性,决策的具体实施可能根本谈不上理性。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管理理论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假设存在一个“有限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的世界。他用“满意的行为”这个概念代替了最大化(maximizing)或最优化(optimizing)行为的古典概念。他认为决策者会依次分析各种预备方案,直到找到一个满足最低要求的方案为止。^[3]这种“有限理性”不但表现在决策者个人认知的有限性、国内政治需要以及各种偶发因素的限制上,更主要

地还表现在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的影响上。危机决策的“有限理性”必然导致危机处理过程的“有限理性”,最终导致危机的决策者不可能完全理性地掌握危机的进程。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惟一一次直接的核对抗。在危机过程中,美苏两国既进行着关于国际威望的零和博弈,也进行着关于核战争的非零和博弈。面对美国的反应,苏联面临的是将导弹撤回国还是坚持部署在古巴的选择。而对于美国,面临的是挑起战争还是容忍苏联的挑衅行为的选择。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可一方退让而另一方不退让则会使退让方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美国约翰·F·肯尼迪政府的危机决策和处理受到了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的双重影响,充分体现了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二、国际权力政治的影响

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最高权威,当一国受到另一国威胁时,它必须主要通过自助来确保生存。处在安全困境中的国家拥有越多的权力,其生存就越能得到保证,其他国家就越不敢正面挑战它。相反,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通常会占弱国的便宜。国际危机本身是一种零和博弈,一国赢得声望,而另一国颜面尽失。因此,如果不是企图利用

危机来挑起战争,那么当国际危机爆发后,一国通常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一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避免危机升级成为战争。在一个由两人参与的零和博弈中,理性的策略应该建立在“最小化—最大化原则”基础上。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尽量把能够确保的最小利益最大化,或者把必须承担的最大损失最小化。如果双方都希望通过“强迫性交易”(coercive bargaining)损害对方的利益来维护或增加自身的利益,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加剧、危机升级,这就违背了国家追求的第二个目标,不再完全符合理性。事实上,决策者在国际危机管理中常常采取激化矛盾、将冲突表面化、乃至升级危机等手段,直到危机即将转化为战争的最后时刻,双方才不得不彼此妥协,以可以承受的风险来达到有限目标。在博弈中,实力较弱、更不愿承担战争风险的一方通常将首先让步,并甘愿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通过升级危机来解决危机”的有限危机升级策略或战争边缘(brinkmanship)策略正是国际权力政治的影响结果,反映了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古巴导弹危机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双重博弈。在美苏互相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背景下,避免核战争事实上又是双方利益的共同点,也是彼此试探时不能越过的底线。肯尼迪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危机界定为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排除了或是与卡斯特罗接触或是推翻卡斯特罗的方案,而以苏联作为直接打交道的对手。在肯尼迪政府看来,苏联及其前身沙皇俄国都有着迷信武力、弱肉强食的传统,己方善意的克制很难得到同样的回报,因此对苏联的挑衅必须坚决顶回去。但是,肯尼迪政府的基本目标是既要消除苏联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导弹,又不希望因此而和苏联发生战争。有鉴于此,肯尼迪政府在应对危机时一方面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力争对危机处理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又对危机的进程进行理性的调控,避免使危机升级为战争。

在战略层面,肯尼迪政府发现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动向后,不但在外交上态度强硬,而且制定了相应的军事计划。从1962年8月起,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觉察到苏联对古巴的军运。由于共和党人正在利用古巴问题批评政府,肯尼迪在第一时间便做出了强硬反应,一方面严正声明美国决不能容忍苏联把进攻性的地对地导弹或任何其他进攻性武器引进古巴,一方面采取相应的预防性措施。美国海军的舰艇和飞机对开往古巴的每艘苏联船只都拍了照。^[4]为了对付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建设,9月21日美国军方制定了三个紧急计划,分

别为 Operations Plans 314-61、316-61 和 312-62,其中就包含了对古巴的海上和空中封锁。^[5]10月12日,美国国防部制订了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预案,包括封锁计划、空袭计划、快速反应攻击计划、全面解放攻击计划。^[6]10月14日,理查德少校驾驶的U-2飞机拍摄的照片提供了在古巴确有苏联进攻性导弹存在的证据,中央情报局的专家在辨识后发现在“San Cristobal”附近有三个建设中的中程导弹发射地点,包括8辆中程导弹的运输车。^[7]此时,美国海军已大体上完成了封锁古巴附近海域所必需的军事集结。10月15日,包括四十多艘军舰和四千名海军陆战队的美军在美国南部和加勒比海地区按原计划开始了代号为“PHIBRIGLEX-62”的两栖登陆演习,一直到20日暂停。演习的目标是推翻假想的独裁者“Ortsac”,即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名字的反写。^[8]这次演习明显带有向古巴和苏联示威的含义。

10月22日19时,肯尼迪总统又主动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电视演说,将原先处于秘密状态的危机突然公之于众,使危机迅速白热化。在将危机责任推向苏联的同时,肯尼迪迅速而又具体地宣布了对古巴实行隔离的初步措施:其中包括对一切正在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海上隔离;加强对古巴本土的监视;宣布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的攻击,因而有权对苏联进行全面报复性的回击。^[9]在当天写给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信中肯尼迪强硬地表示:“如果古巴事态持续发展,美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10]第二天,肯尼迪正式签署了对古巴实施海上隔离的公告。在一项秘密报告里,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列出了下面的战备部署:二十五万兵员,对古巴各种目标进行二千架次出击,九万名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的入侵力量。^[11]除了批准该计划外,肯尼迪还下令加速北极星潜艇计划的实施,使服役的弹道导弹潜艇从原定的三艘增加到九艘。^[12]

这种用对抗回应挑衅的做法,相当大程度上加剧了危机,并且极有可能使危机转化为战争。但是,肯尼迪的目标绝对不是战争。在向苏联施加战争压力的同时,肯尼迪也始终没有放弃外交努力,通过与赫鲁晓夫的直接通信,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秘密外交,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等渠道,保持与苏联方面的紧密联系,尽量争取信息交流的准确和畅通,并根据苏联的反应适时地做出某些妥协。当赫鲁晓夫

提出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的解决方案后,肯尼迪很快做出积极回应。28日苏联公开表示,由于美国已保证不入侵古巴,苏联已停止在古巴的导弹施工,并已下令将这些武器运回国内,同时愿意让联合国代表前往核实。肯尼迪又不失时机地称赞赫鲁晓夫作出了“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并阻止人们用“投降”、“丢脸”一类话语刺激苏联。^[13]

在战术层面,肯尼迪政府实施战争边缘政策来应对危机。一方面如上所述明确向苏联表明不惜一战也要消除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导弹的决心,并始终对苏联保持足够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在军事行动方式的选择上又非常慎重,以尽一切可能避免将危机升级为战争。对于如何消除苏联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导弹,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司法部、财政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方面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商讨对策时,一些人倾向于采取包括“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以摧毁古巴的导弹设施,肯尼迪从一开始就和麦克纳马拉、罗伯特·F·肯尼迪等力主采用“封锁”的方式,既坚定地显示美国的决心和力量,又避免因不留余地导致苏联做出过分反应。在何时封锁、何时空袭的问题上,肯尼迪政府又尽可能地多给对方一些考虑的时间。10月23日,肯尼迪总统听从了英国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Davie Ormsby Gore)的建议,在和麦克纳马拉通了电话后,将拦截线从延伸八百海里缩减到五百海里,以便给苏联更多的分析思考时间。^[14]10月27日,一架美军的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地对空导弹击落,执委会的人几乎一致认为,必须在第二天一早就用空中打击去摧毁导弹基地。肯尼迪担心这将导致苏联的核反击,因此只同意如果美军的侦察机在28日仍然遭到攻击,并且美国知道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和苏联沟通的结果,那么美军将用空袭摧毁古巴的萨姆地对空导弹基地。同时,他也采纳了麦克纳马拉的提议,即召集24个空军预备役中队,包括1.4万人和300架运输机,加大对苏联的军事压力。^[15]

三、国内官僚政治的影响

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的官僚政治模型假定在不同的决策单位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并将对外政策的形成视为官僚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理性的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从本领域的特点出发来看待问题,并指出哪些问题是重要的。^[16]官僚政治模式描述的是一种既非集权、又非理智化的决策过程。它

基于一种多元的、权力分散的决策环境。有时某个决策单位的意见会成为主导意见,但通常情况下,不同决策单位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不同,最终的决策结果取决于各成员的“地位权限”和“有效使用这种权限的能力”。在决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最高决策者的控制能力相对削弱,各具体执行部门就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倾向于在最终决策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维护本部门的利益,甚至适当变通。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危机管理的整体理性。官僚机构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和妥协造成的行动不协调,同样反映了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对于美国来说,虽然外交政策最终的决策权在总统手中,但是面临危机时,具体负责危机反应的是美国的各个官僚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有一套自身的行动程序和不可否认的组织利益,并且共同参与危机决策。肯尼迪总统能干预各组织机构的行为,但却不能充分地控制这些组织机构的行为。美国空军、海军、陆军和中央情报局都有其各自的部门利益。在管理国际危机时,它们的行动倾向和行动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当各部门分别按照各自的“理性”行事时,就可能会导致整体的非“理性”。它们都试图通过损害敌对国家的利益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其结果可能是敌国的报复损害了本国更重要的整体利益。此时,以总统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就不得不从全局出发“理性”地制止这种行为。这种因国内官僚政治而导致的国际危机管理中的“有限”和“理性”的矛盾和一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也充分显现。

在执委会讨论危机对策时,美国空军始终倾向于对古巴实施空中打击。10月18日,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将军同肯尼迪总统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李梅认为必须采取空中轰炸这样的“外科手术式”以摧毁古巴的导弹设施,肯尼迪则关注苏联人将会作出的反应,当李梅向他保证苏联不会有什么反应时,肯尼迪则明确表示“他们同我们一样决不会白白放过这些情况而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在发表了那么多声明之后,决不会让我们搞掉他们的导弹,杀死大量俄国人,而一点也不干些什么。如果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当然会在柏林采取行动。”^[17]尽管如此,斯威尼等空军将领仍然希望对古巴发起全面的、轮番的空中打击,并坚信空袭将会取得成功。^[18]肯尼迪却始终排除这一方案。

美国海军在危机期间以保证舰艇和人员的安全为第一要务,同样倾向于使用武力来解决危机,并经常偏

离最高决策层的意图。10月23日肯尼迪决定将拦截线从八百海里缩减到五百海里时,海军方面明确表示反对,因为设定八百海里的标准,是为了使舰船处于驻在古巴的米格战斗机的航程之外。但是肯尼迪坚持了自己的决定。

尽管如此,危机失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10月24日上午,两艘苏联船——“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接近了拦截线,一艘苏联F级常规潜艇B-59也已经插入两船之间的阵地。美国“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奉命用声纳信号通知该潜艇浮出水面以证明身份,携带反潜设备的直升机盘旋上空给予支援,驱逐舰也协助跟踪。可是苏联方面不肯首先退却,他们也需要执行“强迫性交易”政策,对美国的警告不予理会,继续保持潜伏状态。为了促使苏联潜艇上浮,美国海军不惜向它投掷了小型深水炸弹。最后,这艘苏联潜艇在受到相当程度的损伤后被迫浮出水面,并接受了美国海军的盘问。^[19]从美国海军的角度来说,如果不能迫使苏联潜艇上浮,就会使美国海军自身面临巨大的危险。从苏联海军的角度来说,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只能上浮或反击。当时,苏联的F级常规潜艇上装备的是53-58型直航鱼雷,可携带15千吨TNT当量的核弹头。^[20]在受到美军深水炸弹攻击时,苏联潜艇的处境极其危险,即使艇上的军官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授权,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由于精神高度紧张,而选择向美国驱逐舰发射携带核弹头的鱼雷。幸运的是,当时在艇上的支队参谋长海军中校阿尔希波夫拒绝发射核鱼雷,而是选择屈辱地浮出水面,从而避免了将危机升级为战争。

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这个海域的或正在从大西洋驶向古巴的六艘苏联潜艇都曾遭到跟踪或骚扰,而且不时被迫在美国军舰面前浮出水面。^[21]肯尼迪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战争边缘。10月27日晚,一艘装载着导弹的苏联货船“格罗兹尼”号靠近了拦截线,罗伯特·肯尼迪建议默许放行,肯尼迪总统也表示:如果它通过了拦截线,我们就让它前往古巴,但此后任何违禁的船只都不准进入隔离区,事实上已认可在必要时即使退让也要避免战争。^[22]同样,“格罗兹尼”号虽然越过了拦截线,但在美国军舰向其发射照明弹后也不得不停止了前进。^[23]

在宣布对古巴实施“隔离”后,肯尼迪还担心美国的陆军导弹部队在非常情况下可能会擅自行动,于是在10月22日的执委会会议上特别强调,必须通知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的人员,如果他们遇到苏

联攻击,不能发射“朱庇特”核导弹还击。^[24]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及时获得相关的情报,不断加大古巴和苏联的侦察力度,不可避免地激怒了对手。10月27日,几架前往古巴侦察的美国飞机遭到地面炮火的袭击,由小鲁道夫·安德森少校驾驶的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一枚萨姆导弹击中,机毁人亡。^[25]与此同时,一架美军U-2飞机在北极地区侦察时在苏联远东地区楚科奇半岛的领空迷航,遭到一群苏联战斗机拦截,后被闻讯赶来接应的美军战斗机找到并护航安全地回到基地。这些事件明显地激化了危机。赫鲁晓夫在28日写给肯尼迪的信中说:“你们的飞机侵犯我们的边境,而且还是在我们两国正处于如此令人忧虑的时刻,在一切都处于战备状态的时刻。要知道,美国的入侵飞机完全有可能被认为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这也就有可能促使我们采取非常不幸的行动。”^[26]在执委会,大多数人力主以武力回敬。肯尼迪则认为这样只能导致双方将武力行动相继升级到“第四步”、“第五步”甚至“第六步”,^[27]他顶住了来自内部的压力,坚持对苏联软硬兼施,从而避免了危机的升级。

四、分析与总结

肯尼迪政府的古巴导弹危机管理表明: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特别是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的干扰,但是“有限理性”的危机管理仍为危机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危机期间,由于“有限理性”的“有限”,使得危机不断激化,一度有转化成战争乃至全面核战争的危险,但也正是由于“有限理性”的“理性”,使得双方的决策者都意识到局势随时都可能因为意外因素而失控,因此被迫在最后时刻选择彼此妥协来和平地解决危机。

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导致的两种“有限理性”是有差别的。国际权力政治引起的“有限理性”为最高决策者所认识并自觉地用来维护和获得国家利益。国内官僚政治引起的“有限理性”虽然也能对解决危机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却并不符合最高决策者的意愿,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因此需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两种“有限理性”分别对应于确定性威胁和不确定性威胁。前者是“如果你不顺从我的意志,我将实施威胁”,后者是“我可能实施威胁,也可能不实施,但是最后的结果我也无法确定。”显然,后者包含的风险更大,可能导致意外战争。最高决策者应该避免伤害对方的核心利益,并设法让对方适当地挽回颜面,以维护对方对局势的基本控制能力,防止各种非理性的因素主导危机

的进程。在“有限理性”的指引下,国际危机管理的结果至少将满足双方的最低要求,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相对的最大化,即获得的利益最大化或损失的利益最小化。

[注释]

- [1] 《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963 页。
- [2] Marshall Dimock, *A Philosophy of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p. 140, 转引自[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02 页。
- [3]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603 页。
- [4] [美]莫顿·贝科威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M],张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152 页。
- [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1 - 1963, Volume XI, Cuba, 435, Telegram From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Commander in Chief, Atlantic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Commander in Chief, Atlantic Fleet, Norfolk, September 21, 1962, 4 36 p. m.
- [6] *FRUS*, 1961 - 1963, Volume XI,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 13,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for Operations of the Joint Staff (Unger)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itze), Washington, October 12, 1962.
- [7] *FRUS*, 1961 - 1963, Volume XI,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 16, Editorial Note, Chronology of Air Force Actions During the Cuban Crisis, 14 October-30 October 1962; 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Liaison Office, pages 11-12.
- [8] *FRUS*, 1961 - 1963, Volume XI,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 17, Editorial Note,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 1963, pages 2-3.
- [9]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M],仲宜译,三联书店,1981 年版,第 552 页。
- [10] *FRUS*, 1961 - 1963, Volume XI,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 44,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Chairman Khrushchev, Washington, October 22, 1962.
- [11] [美]罗伯特·F·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M],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21 页。
- [12] [美]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M],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版,第 557 页。
- [13] 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37 页。
- [14] 同注[11],第 28 页。
- [15] *FRUS*, 1961 - 1963, Volume XI,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 97, Summary Record of the Ninth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October 27, 1962, 9 p. m.
- [16] 同注[3],第 615 页。
- [17] 同注[11],第 9 页。
- [18] *FRUS*, 1961 - 1963, Volume XI,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 36, Notes on Meeting With President Kennedy, Washington, October 21, 1962. Washington National Records Center, RG 330, OASD (C) A Files: FRC 71 A 2896, Misc. Papers Regarding Cuba.
- [19]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the 4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U. S. Navy, TOP SECRET/SECRET/ FOR OFFICIAL USE ONLY, Charts/ deck logs of anti-submarine warfare operations related to USSR submarine B-59, October 1962.
- [20] 王子聿:《F 级大型常规潜艇》[J],《舰船知识》2003 年第 4 期。
- [21] 同注[11],第 35 页。
- [22] 同注[15]。
- [23]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the 4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Photographs, October 27, 1962: The Soviet ship Grozny crosses the quarantine line, but stops after U. S. Navy ships fire star shells across her bow.
- [24] *FRUS*, 1961 - 1963, Volume XI,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 40, Editorial Note.
- [25] *FRUS*, 1961 - 1963, Volume XI,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 94, Summary Record of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October 27, 1962, 4 p. m.
- [26] 苏联历史档案 SD05240“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信”(1962 年 10 月 28 日),转引自:杨存堂编:《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07 页。
- [27]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四)[M],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1361 页。

作者简介:荣正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2004 级硕士生。(上海,200083)

胡礼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6-11-06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Limited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with Cuban Missile Crisis as example
by Rong Zhengtong & Hu Lizhong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resident Kennedy's decisions in the crisis were made on rational analysis.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management", the actual management is only rational in a limited sense. Since it was "limited", it involved the danger of turning the crisis into war;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ationality", the crisis finally ended peacefully.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us provides us with usefu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mitedness" and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 6 American Hegemony and European Independent Defense: Critique on the Balancing Theory Explanation
by Liu Feng

In recent years,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en pursuing and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defense. Differen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presented us with competing hypotheses and explanations on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balancing explana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dependent defense is not strictly a balancing act against American hegemony. Broadly speaking, we should avoid stretching the concepts of IR theory, and should make a more reasonable classific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the states.

- 11 Dual Identity Crisi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Guo Yan

The IR theories dominated by rationalism have long neglected th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national identity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s a result of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and identity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suffering from dual crisis of identity. They need enough time to build internal identity and to get external one. Only by means of development could they succe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6 US-European Relations and the Lifting of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by the EU
by Liu Deshou

The European Union began to consider lifting its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in 2003, which was mainly promoted by France and Germany. EU's consideration of lifting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EU in their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he fact that the US has prevented the EU from lifting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shows that the US has the ability to constrain the EU from developing it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which indicates a dim future for EU's lifting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 21 An Analysis of the Divergence of Policies to Japan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Post-WWII
by Wang Shiming

Australia and the U.S. were allies during the Pacific War, but there existed big divergence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n dealing with problems of post-war Japan, such as ceremony of surrender by Japan, military occupa-